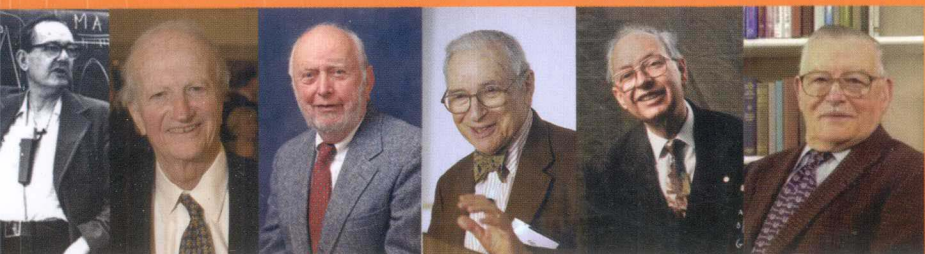


未名社科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nversations with Nobelists abou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竞争与合作

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

詹姆斯·艾尔特

James E. Alt

[美]

玛格丽特·莱维

Margaret Levi

/主编

editors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万鹏飞 常志霄 梁江 刘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



# 竞争与合作

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

詹姆斯·艾尔特

James E. Alt

[美]

玛格丽特·莱维

Margaret Levi

/主编  
editors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万鹏飞 常志霄 梁江 刘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51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美)艾尔特等著;万鹏飞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1-18231-4

I. ①竞… II. ①艾… ②万… III. ①经济-研究-世界 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F112 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1577号

James E. Alt, Margaret Levi, and Elinor Ostrom, editor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nversations with Nobelists abou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1999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12 East 64<sup>th</sup>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21.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with the formal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

著作责任者: [美]詹姆斯·艾尔特 玛格丽特·莱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主编  
万鹏飞 常志霄 梁江 刘杰 译

责任编辑: 倪宇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231-4/C·06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印刷者: 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3.75印张 427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前 言

本书缘起于1997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会议项目。那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学会的新任主席,她邀请詹姆斯·艾尔特和玛格丽特·莱维和她一起共同担任这个项目的主任。我们三人都对政治制度研究有兴趣,而且都对应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制度感兴趣;人们通常将这种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制度的方法称为“新制度主义”。我们希望利用这次年会项目的机会,开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制度研究的严肃对话。但是,究竟哪些经济学家应在受邀之列?一种显而易见的策略是,让经济学界自身从那些已经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进行选拔。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已经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选择了一些我们认为是对政治学研究贡献很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选择了最终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形式:对于每一个对政治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影响的诺贝尔经济学家,我们都邀请两位政治学家写出各自的评论;然后把这两篇论文提前发送给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邀请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就此做出回应。这些评论文章和回应文章先后被提交于一系列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是1997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三次美国政治学会会议以及1997年11月在鲁塞尔·塞奇基金会召开的三次会议。这些评论文章和回应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干。我们也记录了这些会议的听众围绕这些论文所展开的讨论内容。1998年4月我们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又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从威廉·基奇(William Keech)、杰克·奈特(Jack Knight)、加里·米勒(Gary Miller)那里获益良多。另外,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全体会议上就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做了公开演讲。在准备本书的导论部分和结论部分时,我们又吸收了这些新的内容。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政治学会和鲁塞尔·塞奇基金会对这个项目所给予的资金支持。我们也要感谢卡内基·梅隆大学社会与决策科学系对该项目所给予的额外行政和资金支持。在华盛顿特区,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非常豪爽,同意出来做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评论人,对他的思想和评论我们深表谢意。我们感谢比尔·基奇(Bill Keech)在匹兹堡主持学术会议期间的热情周到。我们还要表达对美国政治学会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尤其要感谢凯瑟

## 2 竞争与合作

琳·鲁德尔(Catherine Rudder)、珍妮弗·理查兹(Jennifer Richards),正是她们的努力使华盛顿会议得以顺利举行。我们亦要感谢鲁塞尔·塞奇基金会的沙伦·麦兹尼(Sharon Maccini)对纽约会议所做出的必要安排,感谢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的工作人员玛丽安·施瓦茨巴赫(Marian Schwarzenbach)、卡罗尔·戴维森(Carole Davison)对鲁塞尔·塞奇基金会的资金管理所给予的帮助。我们要特别感谢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理论与政策分析中心的萨拉·科尔伯恩(Sara Colburn),她为小组讨论会议的详细记录整理付出了艰辛。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华盛顿大学的马特·莫(Matt Moe)、特里萨·巴克利(Theresa Buckley),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我们三人所在的大学在许多环节上对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努力。

# 目 录

## 导 论

詹姆斯·艾尔特 玛格丽特·莱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 (1)

**第一章 肯尼思·阿罗** ..... (8)

I 肯尼思·阿罗生平 ..... (8)

II 肯尼思·阿罗:福利整合和政治理论的进展  
诺曼·弗罗利希 乔·奥本海默 ..... (11)

III 偏好与信仰加总中的混沌和均衡  
诺曼·斯科菲尔德 ..... (42)

IV 对评论的回复  
肯尼思·阿罗 ..... (62)

**第二章 赫伯特·西蒙** ..... (68)

I 赫伯特·西蒙生平 ..... (68)

II 理性之谜:赫伯特·西蒙政治观的反思  
罗伯特·古丁 ..... (71)

III 有限理性、政治制度和对结果的分析  
布赖恩·琼斯 ..... (99)

IV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融合  
赫伯特·西蒙 ..... (127)

**第三章 詹姆斯·布坎南** ..... (135)

I 詹姆斯·布坎南生平 ..... (135)

II 严肃对待宪政:布坎南对 20 世纪政治学的挑战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 (138)

III 詹姆斯·布坎南对公共经济学、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贡献  
托马斯·施瓦茨 ..... (153)

IV 对奥斯特罗姆和施瓦茨的答复  
詹姆斯·布坎南 ..... (171)

<b>第四章</b>	<b>加里·贝克尔</b>	(174)
I	加里·贝克尔生平	(174)
II	加里·贝克尔:赞誉、拙见和自省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177)
III	社会资本 罗素·哈丁	(190)
IV	评论 加里·贝克尔	(210)
<b>第五章</b>	<b>道格拉斯·诺斯</b>	(218)
I	道格拉斯·诺斯生平	(218)
II	格拉斯·诺斯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 芭芭拉·盖德斯	(221)
III	国际制度中的意识形态与职业主义:源自道格拉斯·诺斯 理论的洞见 罗伯特·基欧汉	(252)
IV	对盖德斯和基欧汉的回复 道格拉斯·诺斯	(273)
<b>第六章</b>	<b>赖因哈德·泽尔滕</b>	(279)
I	赖因哈德·泽尔滕生平	(279)
II	博弈论、结构和顺序:赖因哈德·泽尔滕对政治分析的 贡献 肯尼思·舍普斯勒	(282)
III	不确定条件下的身份选择——对泽尔滕二元方法论的 思考 戴维·莱丁	(298)
IV	对舍普斯勒和莱丁的答复 赖因哈德·泽尔滕	(329)
<b>第七章</b>		(335)
I	宪政经济学中三个研究项目 詹姆斯·布坎南	(335)
II	期待着政治学和经济理论的联姻 道格拉斯·诺斯	(340)

III	对詹姆斯·布坎南和道格拉斯·诺斯发言的评论	
	赫伯特·西蒙 .....	(345)
IV	关于政治学的思考	
	肯尼思·阿罗 .....	(348)
V	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评论:发现与验证	
	赫伯特·西蒙 .....	(354)
<b>第八章 结论</b>		
	玛格丽特·莱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詹姆斯·艾尔特 .....	(359)



# 导 论

詹姆斯·艾尔特

玛格丽特·莱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当我们最初设想这一系列对话的时候,即请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他们的研究对政治学作出的贡献谈谈他们的想法,同时,请一些政治学家就诺贝尔经济学家对政治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发表他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想在不做相当多主动介入的情况下会得到如此一本内在逻辑一致、富于整体性的书。当然,本书的那些作者并没有任何刻意追求同声一律的想法;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确有清晰可鉴的共同点,找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件难事。一个不言而喻但却是一目了然的主题贯穿于他们的评论中,这就是:对经济分析的新古典主义标准范式、特别是对把这种范式视为实证分析基础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尽管对新古典主义分析的不满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参见 Furubotn and Richter, 1994, 11);但让我们感到有些惊讶的是,竟有这么多获得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的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这种不满!

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去夸大这一点。这些评论中,并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表示明显的不满。这个基本假定是,个人选择是其他一切理论环节的分析基础。事实上,正是我们对下列问题的共同兴趣促使我们组织这样一本关于认真对待经济学的一系列对话的书,这些问题是:制度如何塑造个人的选择、信仰和策略,个人的选择、信仰和策略又如何塑造了制度。新古典主义范式值得我们思考,并不仅仅因为它在许多情况下的解释有说服力;而且还因为,这里的任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都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待他的贡献,而这种角度与我们这里的整体角度不同。尽管如此,在这些对话中我们所观察到的是这样一种对待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方式:尽管四五十年前新古典主义范式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这里学者们所做的并不只是挑问题,找毛病。他们的确对那些用来分析人们行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假定感到不满,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建设性的,他们着眼于对它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加工。

有多种方式来描述新古典主义模型的那些假定 (Eggertsson 1990, 3—25)。个人做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而所有的个人选择以四个基本假设为基础:无外在性;无规模收益;无决策成本(也就是,信息完全和无成本的信息和交换);固定的、在个人之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性的偏好。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这个基本假定结构的每一个方面都会被详细地加以考察。我们会就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各自的贡献以及他们构成的整体提供一个架构。我们有意识地使这个架构界限清楚,简洁明了(尽管我们希望在所有标题下所做的思想互动轨迹的设计不要太强求一致)。对这个架构所展示的一些趋向,我们会在结论部分做进一步的讨论。

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并不准备就经济学对政治学的影响做出全面的评论。有人在最近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应该看看米勒这方面的研究 (Miller, 1997)。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全面的评论,我们肯定要请安东尼·唐斯 (Anthony Downs) 和曼库尔·奥尔森来撰写论文了。因此,本书下面所涉及的内容很少谈到政党竞争的经济学分析、投票的经济学分析、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这本文集也不奢求去包揽所有对政治学研究有所贡献的、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科斯 (Coase 1988) 曾经写过一篇在精神实质上类似于本书所选论文的文章。如果时间和资源更充分的话,这篇文章本来可以选入本书的。

让我们现在转到那些选入本书的文章。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分组讨论会议的开讲辞中,鲍勃·古丁 (Bob Goodin) 开玩笑地评论道:

被吸引参加这个项目的有趣收获之一是发现究竟靠什么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件似乎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思想,通常一个已经足够,这个思想要有真实、广泛的、发展了的分支做支撑,这个思想能够用两个词或最多三个词总结出来……第二件事……是要有一份会令人窒息的个人简历。

在汇集对所有被评论人的评论、说明和讨论内容时,编者立刻发现,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不止一个。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得不对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政治学遗产渊源选择一个总结性的短语时,我们将分别给予这些经济学家一个代表性的概念:阿罗 (Arrow):“多数票循环”;贝克尔 (Becker):“利益群体”;布坎南 (Buchanan):“外在性”;诺斯:“交易成本”;泽尔滕 (Selten):“反向归纳”;西蒙 (Simon):“有限理性”。当然,我们得赶快给这些总结性的概念以补充性的说明:西蒙基本上不是一位经济学家;泽尔滕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注重研究人类行为的二元论者,他的研究范围超出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概念;布

坎南也研究宪政和伦理；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都作出了在政治学界得到反响的其他贡献。但是，上面所提供的标签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研究的出发点，是这些经济学家诸多贡献中的一个例证，是我们在本书中展开充分讨论的基本概念。

对新古典主义几个方面的批评集中在这样一个假定上，即不存在决策成本。例如，阿罗的“多数票循环”论指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能确保分散而具有传递性的偏好汇集成一个具有传递性的有序整体。阿罗的多数票循环理论是在最基础层次上反映了对个体偏好进行加总的方法上的几个合意属性的逻辑不一致性。……在经济学中，“多数循环”论使得任何“社会福利函数”变得不确定，而社会福利函数则是用来评估经济活动产出结果的一个指标。然而，在政治学中，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定义、描述并且衡量少数服从多数式的集体选择机制的不稳定性；另一个研究领域注重于向人们展示，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少数服从多数式的集体选择机制的不稳定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人们关注于思考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克服循环问题和其他问题，以便于在生产需要社会整体的偏好指标时能实现效率的最优化。当然，如果循环的可能性是无休止的，决策成本就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可能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生产可能都无法展开。

布坎南的贡献建立在对外部性和决策成本的结果分析基础之上。简言之，他把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所得专门用于经济市场领域的概念转用于政治决策领域。因此，尽管仅仅是个人选择，但如果将政治排除在外则我们对经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研究。部分的原因是经济学与一场按照规则展开的博弈相关，而博弈的不同规则之间的选择不能被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一组既定的规则之内，也存在着（最低程度地）有关税收和公共产品的决定需要做出，做出这些决定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这些决定由结成联盟的那些人做出；对于那些处于联盟之外的人来说，这些决定是强加的、外在的东西。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由于对决策成本和组成联盟规模的依赖。布坎南的工作所留给我们的一个长久性的遗产是下面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在绝对多数统治原则下产生的寻租和外在性是否事实上要比在相对多数统治原则下所出现的寻租和外部性要好一些？然而，这里的中心点依然是将需要付出成本的政治决定看成是经济过程的一个主要方面。

从我们这里的目标来看，诺斯的工作也向我们传递了类似的信息，但是他更专注于人际互动。他的交易成本视角涵盖了买者在几种情形下所面对的那些困难和成本（和卖者向买者做出质量担保的成本），这些情形包括：对产品质量的

观察、围绕买卖双方在以后行动中的协议的监督和执行、合同执行中观察和准备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从交易成本的概念出发,很容易进入到对这样一个理论课题的思考,即制度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如何去解决成本较高的交易问题从而使交易和产出的总体价值或规模能取得增长。作为一个关心长期历史变迁的经济史学家,诺斯的研究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和时间维度的运用服务于对经济绩效和变迁的理解和解释。交易成本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运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像立法机关和官僚机构这样的制度设计和组织机制的研究;二是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那些制度的研究。

赫伯特·西蒙所从事的是对“有限理性”的研究,或者说是研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对个人理性选择的影响。在他最初的关于“满意”概念的陈述中(Simon 1957),他指出,行为人对某种程度的成就,而对超越于这个程度以外的所得并不感兴趣。这就是说,行为人并不想寻求个人满意程度以外更多的东西。西蒙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充分发展的认知理论用来增进我们对经济的认识,如果我们不做足够的实证性工作,将理性的定义建立在实际行为基础之上,我们就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一种最低程度的回应(一个具有怀疑倾向的科学家或一个比西蒙更缺乏耐心的经济学家的立场)是,假定信息的获得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不是免费的和随处可得的。许多经济学和政治学模型(包括阿罗关于组织角色和局限性的一些有趣的研究工作)正是建立在这个假定基础上的。不过,西蒙的观点也取决于人类作为决策制定者的特征和决策过程的特征。

赖因哈德·泽尔滕注意到,他自己的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研究和西蒙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的方法可称为“反向归纳法”——一种分析个人在重复博弈中如何形成应付多重博弈策略的方法。这种方法直接引出了子博弈完美的均衡概念。这种方法在下述两种情形下具有工具性的功效,一是将政治学中的规范分析从合作博弈领域转移到非合作博弈领域;二是将涉及名誉和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分析放到研究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学中这种方法的一项早期应用体现在掠夺性定价模型中(Kreps and Wilson 1982),这种模型随后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Alt, Calvert, and Humes 1988)。有趣的是,完美的子博弈需要博弈参加者必须考虑反事实因素,但对与其他博弈参与者的理性行为不相一致的那些因素则可置之不理。相反,博弈参与者将相互间理性行为的不确定性考虑进来对于解释那些贡献性博弈中的“极度”合作行为具有帮助作用。这方面更为广泛的文献实际上反映了泽尔滕自身著作中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一方面是一种抽象的极度理性标准,这反映在他的完美子博弈的研究中;另一方面是有限的认知能力,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行为模式的研究中。

加里·贝克尔关于利益集团间竞争的研究也表明了一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的不安。我们在这里所列的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文章中都听到了这种不安。基于对政治竞争研究的长期兴趣,贝克尔描述了政府如何才能成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个因素。他将众多的公司视为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在政治上为争取对它们有利的市场结构与条件,如所有制模式、管制模式和税收模式而进行竞争。利益群体(公司)竞争的经济基础是对于它们产品需求的弹性和因为得到政治利益的保障而导致的重大损失。尽管贝克尔的著作几乎很少说到政治供应方面,但是他就究竟如何解释各种政体间实际存在的制度差异提出了一些富有争议的问题。像许多政治学家一样,贝克尔发现,利益群体竞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经济组织和公共政策领域许多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对选择哪些工业进行强制征税、证券和银行业的管制和放松管制、全国性空中航线的开辟 and 环境保护运动。由于新古典主义范式中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因而,贝克尔的分析在如何赋予政府对经济活动结果以适当的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即使在对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政治学遗产的简短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要素。首先,新古典主义范式太狭窄而不能成为解释人类行为的满意模型,不管这个模型的地位是如何的合乎规范标准。这一点在西蒙的著作中表述得很明显,在泽尔滕的著作中也有同样清楚的说明。在1994年的一篇评论中,泽尔滕指出,尽管“人们确实对享乐的体验有着积极的评价情感……但社会规范、道德约束和未经思考的惯例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对话和讨论中,布坎南指出了工作伦理的重要性,贝克尔讨论了内在的偏好问题,诺斯论证了弄清和理解认知复杂性的重要性,阿罗则关心我们是否能解释市场是如何汇集信息并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的。

其次,新古典主义范式的局限使人们广泛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帮助人们解决那些涉及交换、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这样的基本问题。如果投票对于解决任何选择性问题一无是处,那么就不会出现循环的不稳定问题。如果不存在那些让人感到两难的社会困境,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处理交流、合作和协调问题。如果信息是免费地到处可以获得,则专门化和授权就不会产生制度成本。如果不存在非共生性的交换,则人们就不必介意事后机会主义的存在。然而,所有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着,制度就是普遍地在这些两难问题中寻求一种平衡,为有益的交易提供各种机会。显然,没有制度的帮助,这些有益的交易是不会发生的。

再次,由诺贝尔经济学家开辟的许多研究议程唤起人们要做广泛的实证工作。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布坎南的外部性问题。很清楚,有必要做一个实证项

日来决定绝对多数是否在事实上会增加或减少外部性和寻租问题。是否是(因政治安排而引起的)经济损失而导致院外游说集团,对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恐惧,或者是这两者的同时出现?是否如贝克尔所声称的那样,政治供应方面的结构真的不会为利益群体的策略行为创造一种激励机制?诺斯已经对交易成本进行过测量(Wallis and North, 1995),但是,在大部分的实际操作中,人们在下述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一致,这些问题是:一项交易成本的构成是什么?如何衡量交易成本的总量规模?什么是应该摒弃的合同?应该有一个实证项目来检测各种不同类型的制度(政党制度、立法组织)在克服那些老大难问题上的能力。因此,需要实施的、好的项目并不缺乏。

最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所有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认知科学的重要性。除了布坎南这个唯一的例外,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都对理性假设的一些方面提出了质疑。事实上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也是为此而进行的。西蒙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挑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明显的工作也在诺斯那里进行着,他把“精神模型”作为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的一个途径来研究。贝克尔的新课题则集中于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他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基点,由此将规范、信任和类似精神文化因素带入到新古典主义模式中。阿罗则对不完全的和非对称信息保持着长期的研究兴趣。泽尔滕的实验研究与理性的局限性有关。这种重视认知科学的倾向部分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开始于西蒙的实证研究项目比来源于布坎南或诺斯的任何其他研究项目得到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推进。例如,并没有任何比较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人们在处理信息中会经常使用布赖恩·琼斯(Bryan Jones)所说的比例不相称规则,这一点已由卡尼曼(Kahneman 1994)通过实验加以证明。尽管有许多原因促使人们转向认知科学,但是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一些经济学家正回到政治学研究的议程上。一旦由于学科和方法论的巨大差异而分开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在一个基点上结合成为政治经济学,我们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就需要一个新的交汇点,而这正是本书所要建议的。本书所要表明的是,我们的领域——政治学,绝不只是其他人思想的学习者或引进者,政治学领域的实践者对新古典主义的修正和新政治经济学正积极地作出他们的一份贡献。

## 参考文献

- Ait, James E., Randall Calvert, and Brian Humes. 1988. "Reputation and Hegemonic Stability: 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2): 445-66.
- Coase, Ronald. 1988.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fluenc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4(1): 33-47.
- Eggertsson, Thrainn. 1990.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rubotn, Eirik, and Rudolf Richter. 1994.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State and Societ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0(1): 11-17.
- Kahneman, Daniel. 1994. "New Challenges to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0(1): 18-36.
- Kreps, David, and Robert Wilson. 1982.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7: 253-79.
- Miller, Gary. 1997.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3): 1173-1204.
- Selten, Reinhard. 1994. "Commen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0(1): 42-44.
- Simon, Herbert.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Wiley.
- Wallis, John Joseph, and Douglass C. North. 1995.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The Legacy of Ronald Coase in Economic Analysis*, edited by Steven G. Medema. (Aldershot, U.K.: Elgar) vol. 1, 378-444.

# 第一章

## 肯尼思·阿罗

### I 肯尼思·阿罗生平

**肯**尼思·阿罗，纽约人，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曾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琼·肯尼(Joan Kenney)讲席教授和运筹学教授，1991年退休。纽约城市学院毕业以后，他没有谋到高中教师的教职，因此转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在那里，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师从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和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阿罗曾执教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也曾是麻省理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7个国家的至少15所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也是很多学术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美国经济学会，并在1973年担任该会的主席。他曾是All Souls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同时也是Guggenheim的成员。他荣获过约翰·贝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和冯·诺伊曼(Von Neumann)奖章，当然，还有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著作颇丰，包括《存货和生产的数理研究》(1958)、《风险承担理论文集》(1971)、《组织的局限》(1974)以及经典的《社会选择与个体价值》(1951)，最后这本著作的基础即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阿罗自己回忆到(Breit and Spencer 1986)，他做学生的时代，经济学理论并不被老师推崇，因此，他几乎都是通过阅读来自学的。企业如何在几个备选的投资方案中择优这个问题激发了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兴趣。在经历一些挫折以后，当他被问到，在国家被视为具有不同优先偏好的个人集合时，如何去证明国家在国际关系博弈理论家所提出的国家是理性行为者这一命题时，他低落的兴趣又被重新激起。阿罗认为以多数法则来加总个人偏好并不一定能产生一个“理性行为者”的国家。



他提出了最小化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个人理性和一致性并不能确保社会选择的一致性。

更为普遍的意义讲,他论证了四种看似平淡然而却令人满意的属性在逻辑上与任何社会选择偏好加总的机制都是不一致的,其中包括市场机制和多数票规则。这一论证导致:在经济学中,任何用来评估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都变成不确定的;在政治学中,它产生了两个研究项目,都既有理论的又有经验的。其中之一将多数决议集体选择(Miller 1997)的不稳定性概念化,并对此加以描述和衡量。另一个是指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了多数决议的不稳定性,并提供了偏好循环和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以便在需要进行偏好的社会加总时能达到有效的界限。

阿罗对偏好含义的详细描述以及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证明是两项重要的贡献,它们有助于我们寻求一种方法——将公民偏好加总到规范性上具有合意性的结果之中。阿罗接下来又将分配正义纳入他对社会福利函数(或者是宪政,正如开始所宣称的)的分析。奥斯特罗姆认为(在本书中),正是以这种方式,阿罗的工作与传统的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在很多关键的接合处交叉,这与布坎南所做的工作很接近。

弗罗利希(Frohlich)和奥本海默(Oppenheimer)认为阿罗这部分工作——尤其是他试图创造一个“普遍集”,一个同质的个人偏好结构——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现代研究。认知心理学认为框架或者暗示决定了对结果的偏好。他们对阿罗的分配公正和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的论述进行了拓展,并考虑了通过形成政治制度的偏好的道德力量来评价政治制度的含义。

阿罗的其他贡献太多了,很难详尽描述。经济学家必然很看重他对定义一个一般均衡等式条件的论证。在经济学一般均衡的方法中,某产品的需求依赖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就如同一种产品的供给依赖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但是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某种价格,而且人们怎么能找到这些价格呢?在阿罗与杰拉德·德布勒(Gerard Debreu)共同提出一个全面的答案之前,这个问题在数学上一直难以处理。

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注意到,最近一些重要的社会数学定理强调均衡,比如阿罗关于竞争性经济的结论;另一些定理则显得混乱,比如阿罗关于多数票规则不一致性定理。斯科菲尔德讨论了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并认为一种现存的均衡状态并不能保证均衡实现过程中避免混乱无序。他从合作博弈论中举了几个例子。此外,他认为即使存在最优偏好,也很难假定“信仰均衡”存在的条件。他从这个观点中得出结论,无论在市场中还是在政府中,如果是团体所产生的活动,则很难观察到规则制约或者渐变行为,相对于团体内部活动而言,团体间活